



紅樓釋夢。

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行

— 國學精粹叢書 28 —

紅樓釋夢

嚴明／著

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紅樓釋夢／嚴明著．——初版．——臺北市：洪
葉文化，民84
面：公分．——（國學精粹叢書；28）
ISBN 957-8677-81-2（平裝）

1.紅樓夢—評論

857.49

84008434

國學精粹叢書 28

紅樓釋夢

作者／嚴明

執行編輯／張慧茵

封面設計／女人工作室

發行人／薛慶意

發行所／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

地址：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

電話：(886-2)2363-2866

傳真：(886-2)2363-2274

劃撥：1630104-7 洪有道帳戶

門市部／電話：(886-2)2736-2544

排版所／辰皓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版次／84 年 11 月 初版一刷

91 年 02 月 一版二刷

I S B N／957-8677-81-2

定價 350 元

◀ 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▶

自序

中國古代的文學活動，如果從產生《詩經》的先秦時代算起，一直綿延到西元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運動，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歷史。在這漫長的歷史階段中，產生過許多光輝燦爛的文學藝術高峰，比如屈原的《離騷》，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李白、杜甫的詩，蘇軾、辛棄疾的詞，關漢卿的雜劇，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，施耐庵的《水滸傳》，吳承恩的《西遊記》，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等等。這些偉大的作家和作品，猶如一顆顆璀璨的巨星，照亮了中國歷史發展漫長的夜空，留下了永不會磨滅的光彩。

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文學珍品中，最引人注目、影響最大的是《紅樓夢》；最使人入迷、令熱心者爭論不休的也是《紅樓夢》；描寫的內容最豐富、表現方法最生動、藝術性最強的，還是《紅樓夢》。《紅樓夢》出現於十八世紀的中葉，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世，也是清朝由盛轉衰的時候，所以能夠寫成一部反映時代與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。《紅樓夢》裡面匯集了詩、詞、曲、賦、駢文、對聯、謎語

等文學形式的創作，洋洋大觀，可以說是我國古典文學的集大成者，也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說藝術的頂峰，躋身於世界最偉大的名作之列，也是當之無愧的。

自從《紅樓夢》以抄本的形式問世後，隨即就有了熱心的讀者，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特別是《紅樓夢》以一百二十回的篇幅刊行之後，更多的人加入了研究《紅樓夢》的行列，於是使談論《紅樓夢》由一門受人喜歡的「閒學」，迅速發展為一門引人入迷的「顯學」，稱為「紅學」。《紅樓夢》問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，紅學研究的歷史也可以說有一百多年了。對一部小說作品，在如此廣泛的範圍內，有如此衆多的文人學者參與討論、爭辯與研究，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影響力，出現了如此繁多的研究專著與論文，這在中國文學研究史上，是絕無僅有的。一百多年前的曹雪芹，在十年辛苦、耗費心血寫作《紅樓夢》（當時稱《石頭記》）時，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小說會這樣地牽動國人之心，更不會想到後世竟會出現一門專門研究他和他的小說的紅學。

《紅樓夢》確實寫了一場夢，一場人生的大夢，一段愛情悲歡離合的大夢，一段家族興衰消長的大夢。夢則化實為虛，夢則變真為假，夢則入迷成幻，夢則泯滅規範界限，變有限為無限，視暫時為永恆。古今中外，人們對於夢的興趣持續不衰，對於夢的解釋撲朔迷離，關於夢的描寫五花八門。在中國歷代極為豐富的寫夢作品中，《紅樓夢》則又是寫得最為迷人、最為深刻、也最令人費解的。她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性作品，其中凝聚著中華民族無比豐富的文化精神遺產。後來的中國人，要想學習和繼承

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，豐富和發展文學藝術創作，都可以而且應該從《紅樓夢》中汲取藝術營養和創作靈感。《紅樓夢》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一座絢麗奇妙的百花園，永遠充滿著誘人的魅力，永遠是中國小說藝術的典範。本書的撰著宗旨就是想有限的篇幅內，把這座百花園中無限的美妙樂趣介紹出來，以表達高山仰止之敬，以寄託高山流水之情。

作者十六年前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，有幸聆聽紅學界老前輩啟功先生「閒談《紅樓夢》」，細緻入微，妙趣橫生，一下子就把我這個「江南小子」引入了古典小說藝術的「大觀園」意境。後來又有機會領略郭預衡教授、王永健教授、張俊教授等多位老師講談「紅學」，雖然是各說各的，主旨不盡相同，但皆似千岩競秀、萬壑爭流，使人應接不暇；又皆有柳暗花明、峰迴路轉之妙，使人興會無窮。講談者或許無心，聽講的我內心的「紅樓」情結卻越繫越緊，乃至經過十年寒窗苦讀，閱歷一番人生酸甜之後，積累了這部小書。

《紅樓夢》在中國小說史上堪稱一部奇作，她所表現的是一段千古情謎。直到今日，才疏學淺的我對這部巨著仍然有似懂非懂之處，對其妙旨也很難說已經參悟透徹。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，自古已然，但看來從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交流的角度來閱讀解釋《紅樓夢》，已成為「紅學」研究進展的必由之路。本書的撰作也是初步的嘗試。

我所尊敬的王永健教授學識淵博，人品清俊，素日談紅論藝，頗多知音之喜，今特撰妙文弁列卷首，

紅樓釋夢

爭鳴唱和，愈覺其樂也融融。

甲戌元宵序於

姑蘇蠶桑地陋室

王永健教授序——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

《紅樓夢》以其博大深邃的文化意蘊，及其廣泛深遠的社會影響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，研究者稱之為「《紅樓夢》文化」，或簡曰「紅樓文化」。舉凡《紅樓夢》的婚姻文化、禮教文化、佛道文化、詩學文化、戲曲文化、遊藝文化、對聯匾額文化、園林文化、繪畫文化、建築文化、醫學文化、法學文化、服飾文化、飲食文化、茶文化和酒文化等等，皆屬「《紅樓夢》文化」的範疇，真可謂包羅萬象，豐富多彩。可是，《紅樓夢》的創作，既離不開吳文化的孕育和滋養，它的思想和藝術又多方面地表現了吳文化的精粹，顯示了吳文化的特點。一言以蔽之，《紅樓夢》吮吸著吳文化的泥土營養，沾沐著吳文化的雨露陽光，離開了吳文化，也就不可能產生《紅樓夢》這部千古奇書。

「《紅樓夢》與中國文化」，誠如馮其庸先生所指出的：「這是一個十分寬泛的題目，同時又是一個十分切合《紅樓夢》的題目。」①吳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，明清兩代的通俗文學與吳文

化的關係非常密切，而受通俗文學的影響，吳文化區域的作家，也把詩文詞賦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。因此，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，乃是「《紅樓夢》與中國文化」的題中應有之義，當然更是一個「十分切合《紅樓夢》的題目」。由於範圍比中國文化縮小了，具體了，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，也是個更能宏觀把握和切中要害的題目。

嚴明先生撰著的《紅樓釋夢》，是一部主要著眼於《紅樓夢》與文化關係的新著。其立意新穎，見識高妙，更兼有收羅材料之豐富，分析作品之細膩，探究意蘊之深刻，使人讀後有耳目一新之感，導向釋難之便，雅俗共賞，堪稱佳構。蒙他厚愛，囑我以「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」為題，撰寫專文弁言其大著之首。我對《紅樓夢》和吳文化，都頗有興趣，出生在吳地，又在蘇州大學從事了三十餘年的元明清文學的教學和研究，故對《紅樓夢》和吳文化較多涉及。我樂於接受嚴明先生之約，就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這個題目，略述管見，目的只有一個：推薦嚴明先生的大著，並拋磚引玉，希望由於我的拙文引出高水準的研究論著，把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的研究不斷推向前進。

一、曹氏家族的江南經歷和曹雪芹的「秦淮風月」，決定了《紅樓夢》離不開吳文化的孕育和滋養

《紅樓夢》主要寫「都中」（京，暗指北京）之事，而明確的三個輿地概念金陵（石頭城、應天府、江寧府、江寧縣、南京）、姑蘇（蘇州）和維揚（揚州），都是吳文化的中心城市；《紅樓夢》以北京話為基礎，但存有大量的吳方言；《紅樓夢》中有大量關於北京和旗人風俗習慣的描寫，也不乏江南風俗

的表現；《紅樓夢》的現實故事，是從姑蘇的閨門這個「最是紅塵中的二等富貴風流之地」寫起的；《紅樓夢》中的衆多女子，最主要、也最有藝術魅力的是「金陵十二釵」；《紅樓夢》還寫到許多姑蘇的名勝古蹟、土特產和工藝品，諸如此類，皆可窺見吳文化的痕跡和影響。但是，探討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的關係，僅僅停留在這樣的淺層面，是無法說清楚其中的原委的。依筆者之淺見，對《紅樓夢》與吳文化作深層的研究，首先必須從作者的生活經歷和創作思想入手，以探討曹雪芹受吳文化的薰陶。這就不能不對曹氏家族的江南經歷，以及曹雪芹的「秦淮風月」作一番考察。

「燕市哭弦悲遇合，秦淮風月憶繁華！」這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《贈芹圃》詩中的名句，它藝術地概括了雪芹一生從南京到北京的盛衰遭遇，隱寓著感傷的舊事夢，凝聚著悲憤的辛酸淚。

曹家隨著發跡變泰，從北京來到南京、揚州和蘇州；又因抄家敗落，從南京返回北京。曹家與北京，以至東北的遼陽，固然有著密切的關係；與江南的南京、揚州和蘇州等古都名城，也結有不解之緣。南京是曹家全盛時期的基地，揚州鄰近南京，又是曹寅任鹽務、設局刻書之地。曹雪芹的童年、少年時代主要生活於南京，而「揚州舊夢」在其心頭，與「秦淮風月」和「燕市哭弦」佔有同樣的重要地位。蘇州，則以其旖旎的風光、有趣的風俗、高水準的飲食文化和工藝美術，特別是獨具風韻的崑曲藝術和園林藝術，也給雪芹留下了難忘的印象。所以蘇州這個既非曹家的發祥之地，亦非曹家全盛時期的久居之地，在曹家的江南經歷和雪芹的「舊夢」中，均不可等閒視之。

康熙二年（西元一六六三年），曹璽奉皇上之命，從北京來到南京，總管江寧織造事務。為了結交更多的江南社會名流，以便在漢族士夫文人中間擴大清朝的影響，曹璽曾多次到蘇州活動。著名詩人和戲曲家尤侗，就是曹璽的座上客，在他的《艮齋倦稿》、《西堂雜俎》等文集中，就有《司農曹公虎丘生祠記》、《棟亭賦並序》、《曹太夫人六十壽序》、《上曹通政書》等有關曹璽之文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（西元一六九〇年）四月，曹寅由內務府廣儲司郎中出任蘇州織造，三十一年（西元一六九二年）十一月奉旨移鎮於金陵，在蘇州二載又八個月。曹寅的文化藝術修養比乃父更高，在他任蘇州織造和江寧織造期間，從事有關織造之事，比之曹璽更為得心應手，在結交江南社會名流、擴大清朝的政治影響方面，成績也更為突出。尤侗，做為蘇州的名流，與曹寅的交往也十分密切。曹寅遊越五日，倚舟而脫稿的《北紅拂記》，尤侗曾在織造府酒宴上觀看了曹家家伶的演出；擊節欣賞之餘，他還題記於曹寅所贈劇本之後^②。曹寅為追懷先德，請嚴繩孫、惲壽平、黃續等九人所繪四卷十圖的《棟亭圖》上，題詠者達四十八人，其中江南名流就有尤侗、杜浚、潘江、毛奇齡、余懷等人。

或云，曹家一度曾住在拙政園，雪芹就出生於斯園。此說尚無材料證實。關於雪芹的生平，經前人考證，也是眾說紛紜，共有十種說法。約在康熙五十年（西元一七一一年）—雍正元年（西元一七二三年）之間。近年已有兩位先生力主雪芹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（西元一七一六年）^③。在筆者看來，無論雪芹出生於曹寅的生前或死後，也不管他誕生於北京或南京，他曾經歷過「紅樓一夢」^④；在他的童年時

代，隨家人多次到過蘇州，住在城東帶城橋下塘的織造府，並曾盡情地遊覽了蘇州城內外的名勝古蹟和園林，這是可以肯定的。正由於蘇州在雪芹幼小的心靈中，留下了極為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，當他「廬結西郊」，回首往事，創作《石頭記》之時，蘇州的人物和故事，蘇州的民風和習俗，蘇州的園林和崑曲，蘇州的山水和街巷……，便歷歷在目，栩栩如生，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小說的藝術形象體系：富貴風流的閨門外；林黛玉原籍蘇州，妙玉、香菱均係蘇州人；妙玉出家在蘇州西郊太湖之畔玄墓山的蟠香寺；為元妃省親，特地派人從蘇州買來「十二官」，購置行頭，聘請教習，組成梨香院的崑曲家班；林黛玉「見土儀」而思故里；順便介紹了虎丘帶來的自行人、酒令兒、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、沙子燈，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、泥捏的薛蟠小像；林黛玉所作《柳絮詞》，劈頭兩句云：「粉墮百花洲，香殘燕子樓。」（此乃蘇州的百花洲，在姑蘇山上，迄今胥門外尚有小巷名百花洲。）凡此種種，充分說明了雪芹對蘇州的熟悉和熱愛，故而信手拈來，點鐵成金，增添了《紅樓夢》的吳文化色彩、情趣和氛圍。

誠然，上述有關蘇州與曹家和雪芹的不解之緣，已足以說明《紅樓夢》與蘇州殊有關係，雪芹創作《紅樓夢》離不開吳文化的孕育和滋養。但是，這還很不夠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對蘇州的園林藝術和崑曲藝術與雪芹創作《紅樓夢》的關係作出合乎情理的探討。

園林藝術、崑曲藝術和評彈藝術，可說是源遠流長的吳文化發展到明清兩代的三大精品，其中園林藝術和崑曲藝術對雪芹創作《紅樓夢》的影響，實在不可低估。

筆者認為，吳文化孕育和滋養了崑曲藝術，崑曲藝術充分體現了吳文化的特點，崑曲藝術與吳中地曲的民間習俗關係至密。關於這個問題請參見拙作《吳文化與崑曲藝術》^⑤，這裡不贅述。

崑山腔發源於蘇州府的崑山縣，其歷次改革皆與吳中地區的曲師、樂工和戲曲家息息相關。自明代中葉，以迄清代乾隆年間，蘇州一直是崑曲藝術的中心，曲家輩出，崑班如林，名伶如雲，佳作迭出。蘇城內外，從上流社會到下層群眾，人人喜愛崑腔，個個欣賞崑戲，誠如清人沈朝初（憶江南）所歌詠的：

蘇州好，戲曲協宮商，院本愛看新樂府，舞衣不數舊霓裳，崑調出吳閭。

除了以蘇州為中心的吳中地區之外，南京和揚州，同樣崑班林立，搬演「雅部」盛極一時。

曹家的黃金時代，正當崑曲藝術和江南園林藝術的全盛時期。長期在南京、揚州和蘇州擔任織造、鹽務的曹家，為了開展廣交江南社會名流的工作，並接待愛好戲曲藝術的康熙帝南巡，以及日常的自娛和娛賓需要，自然而然地喜愛崑曲藝術，此其一。其二，蘇州和江寧的織造府後花園（皆稱之為西花園），都曾作為行宮，接待過康熙帝，故也有相當的藝術水準。其三，曹寅不只是個崑曲迷，蓄有「家樂」，也是位創作過《北紅拂記》、《續琵琶》、《表忠記》和《太平樂事》的戲曲家。康熙四十三年（西元一七〇

四年）春末，曹寅特邀洪昇到南京，「集江南江北名士為高會，獨讓昉思居上座，置《長生殿》本與其席，又自置一本於席。每優人演出一折，公（指曹寅）與昉思讎對其本，以合節奏。凡三晝夜始闌」^⑥。曹寅內兄李煦，任蘇州織造達三十年之久。他為了博得皇上一笑，曾進獻過由蘇州女伶組成的崑班，培養過弋陽戲班^⑦。李煦之子李鼎亦能粉墨登場，曾「演《長生殿》傳奇，衣費至數萬」。曹雪芹出生於如此富有藝術傳統的貴族之家，耳濡目染，從小喜好戲曲（脂硯齋指出，對於戲曲活動，包括弋陽腔和崑腔，「石頭是第一能手」；並說第五回中的「紅樓夢十二曲」，「語句潑撒，不負自創北曲」。^⑧讀過大量劇本（其中肯定有尤侗、洪昇的作品）；流連忘返於江南各地的園林（尤其是蘇州織造府對岸的網師園），自幼就熱中於崑曲藝術和園林藝術，豈非合乎情理之推測。至於雪芹創作《紅樓夢》，得力於他的諳熟崑曲藝術和園林藝術，這更是顯而易見的。

關於吳文化中的園林藝術與《紅樓夢》的關係，下文將作研討。這裡僅就崑曲藝術對《紅樓夢》創作的啟示和影響，略作論述。

有則記載說，江南曹家被抄之後，雪芹隨家人來到北京，一度曾到內務府主辦的景山官學讀書。景山官學附近有條蘇州巷，蘇州織造府為宮廷選送的伶人就居住於此。當時，曹雪芹厭惡結交宦門子弟，卻私下常去蘇州巷走動，結識了來自蘇州的「奇優名倡」，甚至唱曲串戲，為此有人曾指出，雪芹「不得志，遂放浪形骸，雜優伶中，時演劇以為樂」^⑨。此類記載，雖然查無實據，但皆事出有因。我們從《紅

樓夢》中所精心描寫的「齡官畫蔷癡及局外」和「識分定情悟梨香院」；從寶玉與琪官的親密交往，並確認為「情種，非尋常戲子可比」；從寶玉對芳官的另眼相待的萬般憐愛之中（這也是「意淫」的表現）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寶玉對「戲子」的人格和藝術的尊重，以及寶玉與男女「戲子」們平等相待的真誠友誼。透過這類藝術描寫，不是也能感受和體會到雪芹對崑曲藝術和崑伶的態度嗎？正由於雪芹熱愛和熟悉崑曲藝術，又有這樣的民主態度，一方面，他創作《紅樓夢》時，便自然地插入了許多戲曲活動，尤其是崑曲活動，全面地描寫了一個貴族「家樂」的盛衰際遇，以及蘇州女伶們的悲慘命運，並塑造了不少動人的「戲子」形象；另一方面，在藝術上，《紅樓夢》也深受戲曲技法的影響，在運用戲曲化的手法來刻畫人物、描繪景物、展開情節和烘托場面等方面，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。第二十一回，庚辰本有條脂批，針對賈璉追逐平兒求歡，一個在屋外，一個在屋內，隔窗調笑的細節描寫，指出：「此等章法，是在戲場上得來。」第四十三回，寶玉在水仙庵祭奠金釧兒，茗煙代念祝詞，庚辰本又有條脂批云：「此一祝，亦如《西廂記》中雙文降香第三炷，則不語，紅娘則待（代）祝數語，直將雙文心事道破。」這兩條脂批透露了崑曲藝術對《紅樓夢》情節處理的影響。至於《紅樓夢》所涉及的幾十齣折子戲（主要是崑戲）的演出，既為人們研究清崑戲的演出史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，也有助於正確理解小說的主要人物性格及其悲劇的命運和結局。己卯本第十八回中脂批所說：「《邯鄲夢》中伏甄寶玉送玉。」「伏黛玉死。《牡丹亭》中。所點之戲劇伏四事，乃通部書之大過節、大關鍵。」皆透露了此中消息。

二、《紅樓夢》的思想藝術反映了吳文化的特點

中華文化，大而言之，是由各具特色而風格迥異的江南文化、北方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所組成的。江南文化發源於長江中下游，其源頭為楚文化和吳越文化，包括後起的珠江流域的粵文化和閩江流域的閩文化等。江南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不同特色，在民歌和戲曲的風格上表現得異常鮮明。明代王世貞《曲藻亭》曾指出：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，南主清峭柔遠。」王驥德《曲律自序》亦謂：「粵自北詞為南曲，易怙忮為風流，更雄勁為柔曼。」這種概括有助於我們對南北文化不同風格的理解。有些研究者認為，江南文化重智慧、重文采，是一種動態的文化、開放性的文化、富於進取性的文化。而這些特點，是與江南的自然地理環境、人文歷史傳統，以及經濟發展情況分不開的^⑩。筆者認為，吳文化（或吳越文化）是以江南文化為母體的多種文化融合體，它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。雖然在中華文化中，吳文化舉足輕重，但目前海內外學者對吳文化及對特點的理解，尚有分歧。不過，上述有關江南文化特點的概括，對我們理解吳文化的地域特色和獨具的風韻，還是頗有啟示的。

《紅樓夢》的思想內容博大精深，其藝術則達到了章回小說的頂峰。封建社會後期的中華文化，其精華和糟粕，在《紅樓夢》中皆有藝術的反映。王希廉對此曾有贊語曰：「包羅萬象，囊括無遺。」他在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·紅樓夢總綱》中這樣說：

一本書中，翰墨則詩詞歌賦、制藝尺牘、爰書戲曲，以及對聯匾額、酒令燈謎、說笑話，無不精善；技藝則琴棋書畫、醫卜星相，及匠作構造、栽種花果、畜養禽魚、針黹烹調，巨細無遺；人物則方正陰邪、貞淫頑善、節烈豪俠、剛強懦弱，及前代女將、外洋侍女、仙佛鬼怪、僧尼女道、娼婦優伶、酷吏豪僕、盜賊邪魔、醉漢無賴、色色俱有；事跡則繁華筵宴、奢縱宣淫、操守廉貪、宮闈儀制、慶弔盛衰、判獄靖寇，以及諷經設壇、貿易鑽營，事事皆全；甚至壽終夭折、暴病亡故、丹戕藥誤，及自刎被殺、投河跳井、懸梁受逼、吞金服毒、撞階脫精等，亦件件俱有。

如此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，博大精邃的文化意蘊，既反映了北方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（主要是滿族文化）的特點，也表現了吳文化的風采。下面，我們將從三個角度，對《紅樓夢》的思想和藝術表現了吳文化的風采這個問題，作一些初步的探討。

首先，吳文化是「得水分」之文化，具有陰柔之美。《紅樓夢》關於大觀園的構思和描寫突出了陰柔之美。

古人云：「文有得水分者，有得山分者。」^①吳文化無疑是「得水分」之文化，它與「水」難解難分。清姚鼐論文學風格，標舉陽剛、陰柔之說，《覆魯絮非書》指出：「天地之道，陰陽剛柔而已。文者，